

## 突破民主困境，迎向海洋新紀元

作者：呂寶欽

書名：台灣政治史

作者：戴寶村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年11月初版

### 本書摘述：

四百年來，台灣民眾無法決定自己的國家形態與歸屬，台灣的歷史詮釋權一直掌握在統治者手中。過去數十來年，台灣史更被納入中國史的範疇，中國史才是歷史研究的正統，縱使有台灣史的研究，多數也是以中國或漢人的眼光來詮釋台灣的發展。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重新反思台灣的歷史發展，建立一個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史觀成為當務之急。

作者以這樣的史觀為基礎下，編寫自史前台灣的原住民部落社會，歷經「荷西殖民國家」、「鄭氏東寧王國」、「清帝國統治」、「日本殖民體制」，以至「中華民國」，以不同時代的統治者為經，以政治、社會制度的變遷為緯，論述統治者、人民與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兼述及不同時期的對外關係，突顯台灣政治發展史的國際色彩。

台灣政治歷史的特色是政治支配政權，統治機制與權力都具有外來性，由於政權變動頻繁，造成台灣社會的動盪和人民的反抗，統治者以其利益和立場制定統治政策，壓迫台灣人民，台灣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常起而抗爭，要求當家做主，因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衝突也是台灣政治史的另一項特色。

書中除了陳述政治史的演變過程，亦討論當前台灣政治發展的困境以及正待解決的問題。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已步入「民主鞏固期」的階段，當務之急在於建立一個更為合身、合理的憲政體制，以及發展一個更為活潑的公民社會。在國家認同的爭議上，以多元主義與公民族主義為基礎，充分理解與尊重各族群的文化與歷史經驗，透過民主的機制解決彼此的爭議，才能真正體現「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精神，並進一步建立台灣在文化上與政治上的主體性，超脫被殖民的歷史悲情。

### 心得評論：

我們這一代歷經了「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在海內外民主有識之士，前仆後繼，奮起推動民主運動的浪潮下，有幸見證台灣從威權體制轉型蛻變為民主體制的過程。記得小時候只要談到政治問題，家長馬上會使以臉色，嚴厲喝止，並慎重告誡：「囡仔人有耳無喙！」，在這樣的肅殺氛圍中，統治者掌控下的台灣史觀，是極盡扭曲的，若不是這波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諸如「二二八事件」的事實真相恐無法重見天日；若不是本土化運動的蓬勃發展，得以凝聚台灣主體性的共識，台灣歷史也無法擺脫附庸於中國史的邊陲論述。

過去威權統治時代，不管是「反攻大陸」、「反共復國」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策，統治者為了其統治目的及利益，硬是將「化外」之島台灣，與中國連結在一起，因此我們所接受到的台灣歷史教育，其主要論述為「一部台灣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漢民族在台灣の開拓、經營和移民史，血濃於水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一體關係的最佳寫照」，讓台灣人產生自以為是中國人的錯誤意識，幸而，隨著本土政權建立，復原歷史真相，加強本土教育，這種荒謬的現象已逐漸改觀。

政治改革過程中，難免會衝擊到既得利益者，過去威權體制下的餘蔭，並不熱衷於民主發展，因為此將進一步弱化他們的相對權力，於是負隅頑抗，形成一股反撲勢力，造成本土政權在深耕台灣的過程，倍感艱辛，民主發展的步履蹣跚、顛躓。當台灣主體意識抬頭時，「去中國化」成為其打壓的藉口，追求台灣主權獨立，提倡本土化運動的人被抹黑為「撕裂族群」、「數典忘祖」。然而據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的「非原住民台灣人的基因結構」研究指出，台灣有八十五％的福佬人、客家人有原住民血統，這項科學研究完全顛覆了「漢人中心史觀」，以為台灣是純種漢人移民為主所構成的海島（自由時報社論，2007年11月21日）。換言之，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具包容性而海納各族群的台灣文化，已迥異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其目的在於回歸本質，為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尋求一個合理的定位。

過去在漢族沙文主義的影響下，種族階級觀為「原住民」貼上「番人」的標籤，讓多數的台灣人隱諱自己身上的原住民血液，加上受到中國文化中父權思想的影響，性別階級觀讓許多台灣人選擇遺忘原住民母系社會的傳統文化，在「慎終追遠」的過程中，往往只追溯「唐山公」之祖系，很少人會去探究「平埔嬭」或「高山嬭」之祖系，台灣人終究是撕裂了哪個族群？忘卻了哪個祖先？

歷史的詮釋因人而異，同一歷史事件，對於不同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會有不同的意義。鄭成功據台做為「反清」基地，漢民族視之為「民族英雄」，但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鄭氏王朝在「番政」的內政問題上，思以教育同化達成漢化目標，未尊重其既有文化習俗，加上常以軍威鎮壓，教原住民情何以堪？在解讀每一歷史事件時，若能擺脫本位主義，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從多元文化的立場，尊重、包容不同的族群文化，我們才能跨越歷史的爭議而往前邁進。

台灣這塊原住民的土地已成為移民者的天下，它讓嚮往獨立自主與富庶生活的人，到此追求自己在原鄉所無法實現的夢想。自古以來，不斷有新的族群移民來台，而幾乎絕大部分的新移民，也會和舊移民進行融合，血統、語言、風俗、文化、價值觀等也互相影響，以致形成今天的「生命共同體」。現在，這種族群融合仍像千百年來一般進行著，來自東南亞的女性，不斷地湧入台灣這個族群的熔爐中，成為新台灣人，造就今日台灣族群更加多元，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

從國會改革到總統直選，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可謂成果豐碩。1996年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結束四百年來外來統治的宿命，人民終於能當家做主，選出自己的國家領導人。2000年總統大選，人民在期待政治改革中，用選票中斷中國國民黨五十餘年的長期執政，完成台灣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也為台灣民主政治寫下歷史新頁。民主的果實得來不易，如何鞏固民主，維持民主制度於不墜，並進一步深化民主品質以邁向先進的民主國家，考驗著全民的智慧。

本書作者劉切指出，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並非不可能走回頭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為例，在民主和專制之間，可能出現一種週期性的擺盪，亦即從威權體制轉為民主體制後，又從民主體制倒退回威權體制。民主政治的發展軌跡，並不是只會直線式的往前邁進，發展除了可能產生停滯，還可能發生逆轉與倒退的情形。

印證台灣現況，2008年總統改選後的政經發展，不免令人憂心忡忡！人民因厭倦政黨惡鬥，國政陷於癱瘓，寧可選擇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讓中國國民黨政權一黨獨大，雖然看不到往昔為反對而反對，蓄意杯葛行政的亂象，國會卻再也無法發揮監督、制衡的力量。所謂「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從近日百業蕭條、失業率急遽攀升，台灣經濟發展的現況與當初競選者的政見及承諾背道而馳，政治

人物的誠信、能力問題，已牽動未來台灣政局的發展；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期間，代表國家公權力的警察，暴力對待手拿國旗表達不同言論的民眾，限縮人民集會遊行的自由，引起國外人權團體的嚴重關切，我們已感受到戒嚴時期，威權統治的惡勢力復辟了；中國政府獨裁專制、反人權、反民主、窮兵黷武的邪惡本質，絲毫未變的情況下，自承為兩蔣信徒的執政者卻背棄「反共」信念，轉變為「親共」、「投共」的立場，歷史的荒謬與弔詭莫此為甚！自我矮化主權與中國深入發展合作關係，讓敵對的中國不斷吸收台灣現有的政經資源，台灣正逐步陷入中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統戰陰謀中，台灣人能不擔憂被中國併吞嗎？

1895年，當時的台灣巡撫唐景崧創立「台灣民主國」發表「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並通電各國、致送各國駐台領事，要求各國承認台灣民主國，但骨子裡卻仍對中國清朝政府「恭奉正朔，遙作屏藩」，定年號「永清」。該宣言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業與列強迭次磋商，僉謂臺灣必先自立，始可予我援助。台灣同胞，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戰死」。其言詞慷慨激昂，熱血澎湃，殊不知在日軍登台不過半月，唐景崧即畏戰潛回中國，許多主要領導人如丘逢甲、陳季同、林朝棟及士紳富商階層人士大多逃逸，以台灣民主國的18位地方首長為例，日軍侵台之際，僅5位留任抵抗日軍，其餘均去職內渡。

歷史公案，殷鑒不遠，我們不願台灣重蹈覆轍。當朝公職人員爭相往對岸中國朝聖，絡繹不絕於途，這些公職人員對國家的忠誠度，豈止「國籍法」所能規範，道德良知才是最大的考驗；執政黨片面擱置主權，「以黨領政」規避國會監督的各項國共協商，已讓世界各國誤解「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台灣在東亞擁有優越戰略地位，一旦中國「武力解放台灣」，美日等國將因中國的「內政」問題

無從干涉！

被美國輿論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美國總統」與羅斯福並列的雷根，他堅信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的價值和力量，清楚地認識到共產主義「巨大謊言的空洞性」。他的名言是「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痛苦、怪異的一章，現在正寫著的，是它的最後幾頁」，他也曾說過「共產主義必將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1990年代之初，前蘇聯解體，東歐共黨陣營自由化，柏林圍牆被推翻，共產邪惡帝國逐一崩解中，象徵共產神話的死亡。台灣的執政當局，無視人類的普世價值及民主潮流，反其道而行，擁抱中國共產黨的大腿，將陷台灣於萬劫不復！

其實，若能經由二次政黨輪替所付出的代價，徹底喚起台灣人民「生命共同體」的普遍意識，進而共同捍衛人類的普世價值，這次的危機何嘗不是轉機？台灣舊稱「福爾摩莎」是個美麗寶島，兼具海洋文化中流動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涵性的特質，若能依據本身所具備的海洋性格，包括海權思想、國際貿易、自由經濟、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治國，並善用台灣具備「柔性國力」的潛質，也就是強調人權、民主、愛心、和平、高科技五大訴求的治國方針，台灣必能跳脫傳統外交窠臼，成為國際舞台的一顆耀眼之星。

歷代統治者對於海洋文化不同的見解，形成不同的統治思維，可以提供台灣未來發展的借鏡。鄭氏王朝崛起於海洋，早期為縱橫海上的海商集團，擁有強大的海權，賴以建國，在台灣自立為王。然而進入台灣後，由於屯墾的關係，漸轉變為以農業為主的陸上政權，海權只作為自保之用，海權的沒落，鄭氏王國也隨之衰弱；清國政權深具大陸性格，統治海洋台灣產生許多與大環境相違且不合時宜的政策，如海禁政策，重陸輕海，避免往海洋發展，傳統的思考模式難以

了解台灣民間社會的活力與特殊性。台灣被中國統治的時期，人民原本活潑的海洋性格，經常在不知不覺中變成故步自封的大陸習性。過去五十餘年來政府更將中國大陸虛有版圖的憧憬凌駕於對海洋的認知之上，本來應以海洋台灣為主的國家安全戰略，卻仍抱殘守缺的以源自黃埔血統的大陸意識來主導國家的安危，影響所及自然無法制定適切的海洋發展政策。

1910年代，日本領台不久，台灣總督府即成為日本南進中心，為了將經濟市場從中國華南地區擴大到東南亞，當時的台灣銀行及華南銀行紛紛在東南亞設立分行，均由台灣總督府給予利息上的補助，1936年更成立半官半民的國策公司「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其事業包括在台灣及華南、南洋各地開拓未墾地，從事栽培及移民事業，並以供給拓殖資金的方式，協助在華南和南洋發展拓殖事業的企業，初期項目包括農業、林業、水產、土地、金融、移民等，後又擴及工業、畜牧業、礦業、運輸業等。同時為因應經濟南進而展開的學術南進，以1919年設立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為始，培養第一線南方貿易人才為主，此外，當時擔任總督府醫學校校長的堀內次雄赴南洋視察，了解南洋各地生活及風俗習慣後，認為南洋各地的風土病與台灣大致相同，遂拓展台灣醫學研究南進路徑。1928年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熱帶研究與南洋研究自然成為其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與學術特色。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這段「大正時期的經濟南進」政策，初見台灣的海洋性格，可以提供台灣當前經濟發展的一些省思。台灣在李登輝主政時代主張「戒急用忍」，曾於1993年間提出鼓勵台灣對東南亞投資的「南向政策」，目的在於平衡台商對中國的投資熱潮，同時減輕對中國的經貿依存度；現在毫無設防地讓台灣產業盲目「西進」中國，已造成台灣本地產業的空洞化！忽略了經濟學中「雞蛋不可放置同一籃子」的風險分散，台灣的經濟命脈將被鎖死在中國，已成為

「鎖國政策」的新解。

一般而言，台灣的海洋性格具有傳統海洋國家且又超越他們的特質：一、人民胸懷四海，擁有寬闊的心胸與性格，樂於以平等互惠的心態與不同文化的人交往，但卻不具殖民心態；這一項特質在全球化的趨勢中，是一個可以作為全球公民社會學習的典範。二、人民在長久接觸全球不同文化的經驗中，已學習到能欣賞、吸收別人文化之美的特性，表現出兼容並蓄的文化特質，這是追求人類民主、和平、繁榮的良好典範。在全球化的洗禮下，人類已進入互賴、互存，以及共生、共利的新境界，台灣在面對中國無時無刻與無所不在的威脅時，自有其脆弱性，然而就台灣對人類文明所具有的關鍵性角色與功能而言，台灣存在於國際舞台的價值是不容小覷，這也是台灣國力展現的強項，可以提供我們不同的施政思維。

執政當局應跳脫出兩岸關係為施政主軸的泥淖，莫再將國家安全與利益虛耗在大陸發展上，反觀太平洋東岸的拉丁美洲友邦國家與台灣的邦交長達 60 年，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台灣未來的國家戰略中心，應自台海的「舊兩岸」東望太平洋的「新兩岸」來思考與規劃。「海洋立國」是台灣國家發展的新藍圖，台灣海洋發展的國家戰略思維應以台灣為中心，呈輻射狀全方位向洋發展；並發展以民主、和平為核心的非擴張型海洋戰略，同時結合柔性權力與軍事權力、政府間與非政府組織，以確保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利益。（呂秀蓮，民 93）

**結語：**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在內憂外患中來到了瓶頸，阻止最力、反對台灣更進一步走向民主化及本土化的，莫過於中國，然而執政當局的投懷送抱，更讓它染指台灣的野心如虎添翼，此時此刻的台灣人民應當有所覺醒。雖然目前體制內的監督、制衡力量，在一黨獨大的現



實環境中難以發揮，不過，從過去風起雲湧的人民街頭運動，及民間公民團體組織性的社會運動，我們發現人民的草根力量沛然莫之能禦，「主權在民」的信念可以成為凝聚「住民自決」的後盾，台灣人民應善加利用民主政治中的「任期制度」與「選舉制度」，讓它成為政權的防腐劑，用手中的「選票」來防堵這股紅潮的蔓延。未來台灣若能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公民投票」制度，相信台灣的民主成就及日益茁壯的台灣主體意識，將能發揮以柔克剛的效應，成為對抗中國的最佳武器。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要告訴自己，在海洋台灣千萬年的發展歷程中，依附中國的大陸意識是短暫的、一時的，它只是歷史的偶然；而「海洋台灣」才是長遠的、真實的，這才是歷史的必然。台灣應擺脫被發現、被使役的宿命，重新自我發現與自省，建構一個真正屬於台灣海洋子民的國家。

#### 參考書目：

戴寶村（2006），《台灣政治史》。台北：五南

自由時報（2007.11.21）社論〈台灣人在血統上大多有別於中國人〉

呂秀蓮（2004）《台灣大未來—海洋立國世界島》。台北：知本家